

初编10

附魔、驱魔与皈信

乡村天主教与民间信仰关系研究

王媛◎著

基督教文化
研究丛书

何光沪 主编
高师宁

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神谕的再造

一个城市天主教群体中的个体信仰和实践

蔡圣晗◎著

基督徒的内群分化

分类主客体的互动

孙晓舒、王修晓◎著

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基督教文化研究丛书

主编 何光沪 高师宁

初编 第 10 册

附魔、驱魔与皈信——乡村天主教与
民间信仰关系研究

王媛 著

神谕的再造——一个城市天主教群体中的
个体信仰和实践

蔡圣晗 著

基督徒的内群分化：分类主客体的互动

孙晓舒 王修晓 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品预行编目资料

附魔、驱魔与皈信——乡村天主教与民间信仰关系研究 王媛著／
神谕的再造——一个城市天主教群体中的个体信仰和实践 蔡圣晗
著／基督徒的内群分化：分类主客体的互动 孙晓舒 王修晓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民104〕

序 4+ 目 2+114 面／目 2+84 面／目 2+92 面；19×26 公分

（基督教文化研究丛书 初编 第10册）

ISBN 978-986-404-203-6 / 978-986-404-201-2 / 978-986-404-202-9
（精装）

1. 宗教文化 2. 天主教 3. 民间信仰 / 1. 天主教 2. 信仰 / 1. 基督徒
240.8 104002089 / 104002087 / 104002088

ISBN-978-986-404-203-6



9 789864 042036

ISBN-978-986-404-201-2



9 789864 042012

ISBN-978-986-404-202-9



9 789864 042029

基督教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986-404-203-6 978-986-404-201-2

初编 第十册

978-986-404-202-9

附魔、驱魔与皈信——乡村天主教与民间信仰关系研究
神谕的再造——一个城市天主教群体中的个体信仰和实践
基督徒的内群分化：分类主客体的互动

作 者 王 媛 / 蔡圣晗 / 孙晓舒 王修晓

主 编 何光沪 高师宁

执行主编 张 欣

企 划 北京师范大学基督宗教文艺研究中心

总 编 辑 杜洁祥

副总编辑 杨嘉乐

编 辑 许郁翎

出 版 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社 长 高小娟

联络地址 台湾 235 新北市中和区中安街七二号十三楼

电话：02-2923-1455 / 传真：02-2923-1452

网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罗文化出版广告事业

初 版 2015 年 3 月

定 价 初编 15 册（精装）台币 28,000 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

附魔、驱魔与皈信
——乡村天主教与民间信仰关系研究

王媛 著

作者简介

王媛(1984—),女,201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人类学博士,现任教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主要研究方向是宗教人类学、农村教育研究等,曾出版译著《人类学的邀请》(合译),并在《思想战线》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科研论文和译文。

提 要

天主教传入中国,不可避免的会与中国本土文化和地方信仰发生碰撞。本研究探讨天主教和民间信仰这两个不同文化体系的互动关系,着重分析了两者的附体(附魔)的不同阐释体系和改教现象,继而探讨天主教如何运用话语与驱魔实践成功从民间信仰争取信徒的。在中国一些乡村地区,天主教一方面批判民间信仰中的各路神仙为“邪神”“魔鬼”,另一方面通过施展驱魔实践治病驱邪,彰显自身“灵验”,凸显地方民间信仰体系的“无能”与“欺骗”。信众由民间信仰改信天主教很大程度上源于功利性需求的满足,在许多情况下成为信仰与仪式元素的简单置换,不需付出太多的宗教资本。于是,中国乡村天主教呈现出相互矛盾又内在关联的两个特点:一方面是自身不断受到民间信仰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借用驱魔传教与民间信仰争夺信众,因而不同于国外那种经院化的天主教,呈现出民间化的特点。我国天主教民间化自“礼仪之争”后的禁教便已开始,既是社会政治的推压促使教会不得不与民间信仰发生的互动结果,也是教会权衡利弊之后的自主选择。乡村天主教徒融合了圣经经典和本土文化,在地方性话语背景下对附魔现象进行诠释,体现了天主教在乡村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进一步适应。

大公教会的地方性及其呈现 ——《附魔、驱魔与皈信》序

黄剑波

2014年12月20日

万圣节前夕收到王媛博士邮件，嘱我为其即将印行的新著《附魔、驱魔与皈信——乡村天主教与民间信仰关系研究》作序，俗事杂乱，拖到圣诞节方能略写数言。按欧洲基督教传统叙事来说，也大略可以说是从“魔/鬼”到“神/道”，所以也还算是切题。

王媛博士是我任教以来指导的第二批硕士研究生，其时我自己方属懵懂，所谓指导也就更是糊涂。再加上中国人民大学莫名其妙的两年制硕士规则，无论从时间上、制度上，还是学术积累上都无法保证一篇质量上乘的论文。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王媛博士以及本出版系列另一著作的作者孙晓舒博士（她是我指导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克服了种种困难，顺利完成了她们的毕业论文。其后多年的求学和研究她们转向了其他领域，借此重刊的机会，她们再次回到这个话题，可以说几乎是重写了大部分的章节，无论是从篇幅上还是论述上都有了很大幅度的扩充和延展。尽管作品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且我也并不完全认同文中的一些论述和观点，但与当年的毕业论文相较之下无疑有了可观的进步。因此，尽管我笔债堆积如山，仍愿意欣然作序，对其中一些我感兴趣的话题略加延伸。

《附魔》一书所探讨的，无论是皈信，还是讨论天主教与中国乡村民间信仰的关系，都是值得继续深入的话题，但通读下来最吸引我的是对于“附体”及相应处理的不同阐释。对我来说，这是全书田野材料最细致，思考空

间最丰富最具张力的部分。

王媛特别指出，在华北乡村叙事中，“魔”更有可能是一个外来词汇，是传教士用于解释在乡村地区广为存在的“附体”的结果。此说固然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可以引发的思考却很多。从策略性的角度来说，这与传教布道的目标相关，书中也给出了一些有力的例证表明这个事实。

然而一旦我们不仅仅从功能甚或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的话，可以体察出更为丰富的文化象征的意味。例如，“附魔”的界定和确认本身就表示了鬼魔与天主或偶像与真神之间的对立关系，从而也就表达了信与不信这一对在乡村社区生活中更为现实性的张力。前者如果说主要是在信仰或观念层面上，后者则直接体现在华北乡村熟人社会中“我群”与“他群”的形成、维系及再生产。

因此，“附魔”与“驱魔”就不仅仅是关乎教会或教士的布道努力，不仅仅关乎信徒个人的皈信过程，而是进一步要关乎这样一些问题：作为天主教徒意味着什么？作为中国乡村的天主教徒意味着什么？而这就迫使研究者需要去关注天主教“被认知”（perceived）这个维度，不仅仅是天主教徒如何体认和叙述他们认为的天主及天主教，更关乎其他乡村民众如何观察、理解和想象天主教徒、天主教及由这些信徒及教会所表述的天主。

王媛注意到这种华北乡村的天主教与西方的天主教存在很大的差别，在我看来，这种中国与西方的叙事框架实际上还隐含了这样几组张力关系：乡村与城市，体验与理性，传统与现代。关于这种叙事框架本身的讨论和评论暂且不展开，在此仅强调一点，华北乡村天主教当然与其他地方的天主教有所不同，然而这大概不能简单的说就是中西之别，实际上在文中也提及天主教的驱魔有着相当久远的传统，而且事实上在当今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实践中仍然广为存在，只是呈现方式或“语言”不同了，因为其“语境”有别。

因此，这里更值得讨论的议题是，如此主张“大公性”的天主教之地方性特质及其呈现方式。所谓天主教，其词义 catholicism 本身即宣称了其普世性，但是无论从时间维度看其古代到当下的发展过程，还是从地理空间维度看其在不同区域、人群中的呈现，其多样性和丰富性远远超过了正统教义愿意承认的范围，也大大不同于人们对其单一性的想象。当然，这里也必须指出，或许同样有趣的问题在于，如此多样和地方性的天主教，又是何以可能主张其大公性，以及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其生活于不同语境中的信徒那里

传达和构建了其大公性。

也因此，这里的真正张力或许更应该看成是这样的一对关系：文本 / 教义与生活 / 实践的张力。人类学的天主教研究如果能够对于理解天主教，理解中国（华北乡村）社会有所贡献的话，也理当是在这个向度更多着力。是故，也期待王媛博士能借此在中国天主教研究方面有更多的投入和更出色的产出。



目

次

序 黄剑波	1
第一章 导 论	1
一、研究缘起	1
二、研究内容和框架	5
三、研究方法	7
第二章 文献综述	11
一、附魔、驱魔与附体研究综述	12
二、改教的概念与理论分析	16
三、中国乡村的天主教	18
四、天主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	22
第三章 附魔、驱魔及其文化背景	27
一、田野点宗教概况	27
二、附魔、虚病与皈依	35
三、天主教驱魔历史	46
四、双方的姿态	50
第四章 共通与差异：乡村天主教与民间信仰的 比较	51
一、天主教与民间信仰的相似点	51
二、天主教与民间信仰的区别	63
三、结语	69
第五章 固守与变通：信仰的承续与传播	71
一、基督教的本土化	71
二、新形式的信仰传承	76
第六章 拒斥与融合：天主教的民间化	79
一、天主教民间化的表现	79
二、传教历史与现在：教会角度的分析	81
三、文化背景与能动性：信众角度的分析	84
第七章 总结与讨论	89
参考文献	95
附 录	103
附录一：附魔改教者自述	103
附录二：天主教献县教区历任主教名单	107
附录三：沧州地区大事记 1949-1985（节选）	108
后 记	113

第一章 导 论

一、研究缘起

外来宗教的传入必然会与本土的民间信仰发生文化碰撞，因而二者的关系便成为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诸多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关注的话题。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民间历史的国家，无论不断更替的朝代推崇的是何种宗教，民间信仰的观念根深蒂固，已经成为国人诸多思想和行动的根源。按照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雷德斐尔德（Robert Redfield）将文化区分为“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的说法，民间信仰属于“小传统”（Robert Redfield, 1953）。就传统中国社会随着城镇发展而出现的市民阶层来说，大传统与小传统带有社会分层的意味，大传统代表社会上层的精英文化，小传统则指的是社会下层的乡土文化，普通市民和乡民除了受到大传统的影响外，作为民间文化传统的小传统更是与他们的生活交织融合。

从哲学角度上看，中国文化拥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万物皆为我所用”的融合性。儒家和道家思想起源于中国。儒家思想自春秋时期创立，到汉武帝时，接受儒生董仲舒的提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茫茫历史长河中作用于上层社会和下层民众，形成了中国人“中庸”“忠”“孝”等观念和“祭祖祭孔”的仪式传统。道教同样于春秋时由老子创立，具有浓厚道教色彩的宗教语言已经渗透至许多民间的礼仪中，其思想则影响着众多中国普通人的行为方式和世界观。而后传入中国的宗教则几乎都经历了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了“中国化”的过程，与民间信仰杂糅在

一起，并在长期的互动中形成了融合的局面，从而成为当今中国第一大宗教，甚至推动了佛教在亚洲地区的传播。天主教与基督教的传入则是相对晚近的事情，来华传教士首先要面对的便是自身对宗教唯一性和正统性以及与中国文化相适应的抉择。在坎坷曲折的传教历程中，天主教与基督教通过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结合而本土化、地方化。基督教因其并不拘泥于礼仪形式以及其他许多原因而传播更加广泛。天主教相对于基督教更强调传统，强调圣事，也就是礼仪，保留有祭司也就是神职的等级制，在明清时期因为“礼仪之争”天主教无法得到政府和精英的支持，所以在乡村发展更为迅速。

从天主教作为世界宗教的角度来看，国外天主教会的变革也在深刻影响中国天主教会的发展。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简称“梵二会议”）于 1962 至 1965 年召开，会上陆续通过并发表了 16 个文件，包括四个宪章、九个法令和三个宣言。梵二会议从很多方面改变了罗马天主教会，开启了众多革新运动，使得天主教思想更加适应现代化，在处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关系，天主教会与世界的关系上都提出新的决议，同时强调传教方式和仪式的改革，提倡本土化的传教方式。改革后的天主教礼拜仪式虽然仍保持了它原有的基本精神、程式和内容，保持了天主教的全部节期和庆典等法规，但是梵二会议的改革打破了长期以来礼仪问题上的僵局，赋予礼仪规则一定的灵活性、多样性，简化了一些程序，放宽了一些限制，使天主教礼拜仪式具有了很大程度的开放性（傅安乐，1996）。因为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梵二会议对中国天主教的影响比较滞后，一般认为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天主教会才开始接纳并吸收“梵二精神”。梵二会议提出的许多变革也恰好给改革开放后的天主教的回归和发展提供了许多有利因素。

国内基督教研究的发展情势十分可喜，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上都有长足进步。一些推动基督教研究发展的平台及交流机制得以逐步建立起来。多学科的交流也是一大特点，除基督教神学、宗教学外，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多学科均对基督教研究产生极大热情，提供了多个不同视角。一些学者也不仅仅投身于大陆地区的研究，对海外宗教现象的研究也时有硕果。从关注的角度上，不仅从宏观上讨论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也从微观上描绘宗教信仰者的日常生活实践。“基督教中国化”的研究作为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也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特别是如何处理好基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关系成为重要议题。然而稍有缺憾之处在于,一方面,以往学者关注新教者较多,而对天主教的相关讨论偏少;另一方面,缺乏采用宗教人类学学科视角和方法对天主教以及天主教与中国社会文化互动的研究。而文化人类学对于分析文化接触过程中的采借、敌对、冲突、同化、融合等复杂进程具有学科优势。外来宗教与本土民间信仰的特点及两者的关系一直都是宗教人类学感兴趣的研究主题。因此,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结合文献研究,思考天主教传入后同中国本土民间信仰之间相互接触和互动模式,以及文化接触的影响和未来趋势便成为本项研究的主要目的和重要关注点。

河北省在全国来说是著名的天主教徒聚集地之一,罗马教廷在1838年在河北建立第一个天主教区(西湾子教区),在百余年间先后设立14个正式天主教区¹。1991年,河北省计有教徒约100万人,占全国天主教总数的四分之一,位居全国首位²。其中位于河北东南部的献县教区更是有着悠久的天主教历史。咸丰六年,即1856年的5月30日,“直隶东南代牧区”正式成立,教廷选派法国耶稣会士郎怀仁(Languillat)为直隶东南代牧区首任主教。在2006年,献县教区张庄总堂刚刚庆祝过沧州(献县)教区一百五十周年,气势恢宏。这一地区的天主教主要由法国耶稣会士传入,前五任主教都是法籍耶稣会士,直到第六位赵振声主教开始才是进入国内主教领导时期。直至2008年,这一教区拥有神父百位,教徒约7.5万人,教堂206座。

天主教自近代传入中国以来一直都很重视乡村教会的发展,在我国不同地域都可发现天主教传教士通过各种途径吸引大批教徒入教,而且从家庭甚至整个村庄入手,整体入教,且重视信仰随着家族传承和地方发展得以继承。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落实宗教自由政策,各大宗教都得以恢复和发展,基督教信仰的人数增长迅速,然而更多表现在新教徒的增长上,天主教却并不明显。献县教区拥有深厚信仰基础,也具备福传的各项条件,本应在宗教恢复后获得更好的发展,但事实上单就教徒数量上来看,却是二十多年内于传教方面进展不大。在遭遇了文革对宗教的迫害之后,当地教徒对那段痛苦的经

1 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北省志·宗教志(第68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207。对此,李晓晨提出16个教区的不同看法,详见李晓晨,《近代河北乡村天主教会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

2 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北省志·宗教志(第68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208。

历持有比较深刻的回忆，跟历史上义和团时期一起被人们建构成为对苦难的集体记忆。曾经张庄总堂被占用，大批的资料被焚毁，在巨大压力和恐惧之下，一些教徒由于各种原因而放弃了信仰或声称放弃了信仰。文革之后，国家实施宗教自由政策，恢复了许多堂点，³一部分原来的教徒重新信仰天主教。除这部分教徒的回归外，天主教在当地的传播依旧采取家族延续的方式。当地存在这样的惯例，也即是父母信教，下一代从小领洗入教，并提倡同教友结婚，且无论对方是否信教，子女必须领洗。虽然并未明文规定，却是当地教徒约定俗成的观念。与每年的死亡人数统一计算，每年教徒的增加情况并不明显，基本上和人口自然增长相一致。而这与新教信仰人数在近些年的增长无法相比。

但是，在献县教区却有一个例外的情况发生，也就是 B 镇堂区。笔者经过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发现，当地出现了异于周边地区的大量的天主教徒领洗的现象，与献县教区其他堂区可能偶有零星几个领洗者形成鲜明对比。这么多的新领洗的教徒从何而来？教徒的增长无外乎两种可能：一是不信教者皈依天主教，二是信他教者转信天主教。皈依的原因也多元化，既有理智型和情感型，也有社会型和家庭型，更有功利型。而围绕 B 镇及其周边地区的众多个案可以被归纳为驱魔改教型，其中起关键作用的事件便是引发讨论的缘起——附魔与驱魔。

何谓附魔？附魔可以被看作附体的一种。作为一种关乎神鬼与灵魂的现象，附体在世界各地都有出现，并且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展现。例如，马来西亚的恶灵附体，中国东北民族萨满附体，巴西神医福力斯等等。所谓附魔，也就是按照民间的说法，魔鬼附在这个人的身上，导致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何谓驱魔？这一点是同附魔相对应的，具有天主教色彩的词汇，《圣经》里也多次提到耶稣驱魔的神奇。驱魔就其本身的意义来讲，指的是某些特殊的人员通过一定的行为和仪式将附在另一个人身上的魔鬼赶走。

在献县教区的 B 镇堂区，2007 年一年领洗入教的人有上千人，这些人自有各种皈依缘由，许多学者已有对改教原因的众多案例总结和分析，这里并不赘述，只是强调在这千人左右的皈依者中因为附魔原因而导致由民间信仰皈依天主教的约占五分之一。在一本当地编写的传教小册子中写道：“纵观

3 1980 年，国家下发文件恢复宗教活动，献县教区也是于此时开始逐步恢复，这是一个过程，有些地区可能还会有所滞后。

我们献县教区，在这方面成绩卓有成效的就是 B 镇堂区。自教会开放至今 20 年来，B 镇堂区教友人数由原来的两千发展到八千人。”

为什么民间信仰遭遇了天主教会会有如此的表现？改信天主教的人们如何评价自己原有信仰和天主教？两者在广大乡民心中是否也有高下的比较？这种衡量的标准又是什么？附魔对于天主教来说是件好事还是坏事？天主教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方式传教？在中国乡村的文化背景下，天主教与民间信仰表现在附魔与驱魔上又能够给我们什么启示？当地人又在这两大不同信仰中作为什么角色出现，对于外来文化的传入又是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一连串的议题引发笔者的思考。

同样的社会现象在不同文化背景（包括宗教背景）的人看来，表象之下或许蕴含着不同的奥秘，对于这些人来说，同样的概念，其含义也可能存在天壤之别。借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术语，在不同宗教信仰群体的语言与解释体系里，能指或许常有重叠，所指可能相差甚远。本研究所要探讨的“附魔”及“驱魔”即是如此。怀着以上一连串的疑问，在总结前辈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走进献县教区，走进 B 镇，走进乡村天主教社区，围绕教徒们眼中和心中的天主教，围绕天主教的传播和发展，围绕驱魔及改教（conversion）开展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研究，以期解析天主教同民间信仰这两种不同的宗教体系在中国乡村社会产生的融合与互动，以及天主教如何与地方文化发生适应和关联的。

天主教的本土化已有许多相关研究者的论文和著作发表，其中大多从历史角度，探讨明末清初以来天主教的发展历程，所引用的也多为史料；也有一部分属于理论研究，较少关注当下新时期天主教与民间信仰的互动过程中发生的本土化和民间化特征，缺乏实证研究。因此在下面的讨论中，笔者将从这一看似古怪离奇的现象入手，探讨中国乡村天主教的一些特征以及天主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问题。

二、研究内容和框架

天主教和民间信仰这两个不同文化体系的互动关系是一个宏大的课题，由于多种因素的限制，想要细致入微同时面面俱到是难以实现的。笔者着重分析了两者的附体（附魔）的不同阐释体系和改教现象，继而探讨天主教如何运用话语与驱魔实践成功从民间信仰争取信徒，总结天主教的民间化特征

并尝试分析其原因。在中国一些乡村地区，天主教极力批判和贬斥民间信仰中的各路神仙，但是又借用具有共通性的仪式器具，施展驱魔实践治病驱邪。信众由民间信仰改信天主教很大程度上源于功利性需求的满足。于是，中国乡村天主教呈现出相互矛盾又内在关联的两个特点：一方面是自身不断受到民间信仰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借用驱魔传教与民间信仰争夺信众，因而不同于国外那种经院化的天主教，呈现出民间化的特点。乡村天主教的民间化现象既受到“礼仪之争”的影响，也是教会传入后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相融合的结果，信众在接受信仰的过程中对民间信仰和天主教的演绎和混合也是重要原因。乡村天主教徒融合了《圣经》经典和本土文化，在地方性话语背景下对附魔现象进行诠释，体现了天主教在乡村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进一步适应。

本书共分为七章。

第一章导论介绍研究缘起、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第二章从附魔驱魔和附体研究、改教的主要观点、中国乡村天主教的相关研究、天主教与民间信仰关系四个方面对前人研究述评，先从现象、理论入手，再落脚于两者互动关系的考察。

第三章首先介绍田野点的宗教概况，而后分析附魔及后续“治疗”以及天主教和民间信仰对待这一系列现象的处理方式和解释，以及对由此而产生的皈依天主教的现象进行分类解读。

第四章围绕附魔和驱魔，结合当地教徒和非教徒信仰和生活，列举天主教和民间信仰多个可资对照的方面并具体分析。两者对附魔均具有自身一套阐释体系，并且通过阐释试图将对手放在一个较低的层次，然而两者之间契合的方面又反映出本质相似的一面。这种相似体现在许多仪式上，天主教采借了许多民间信仰中的仪式元素，看似不同于民间信仰的圣物、圣仪等都带有同民间信仰的类似功能，两者发挥的作用是一致的。由民间信仰改信天主教在许多情况下成为仪式的简单置换。在传播方式上，两者都强调并夸大信仰团体专家治愈疾病的本领。当然，两者表面上也存在差异性，如天主教的一神性与民间信仰的多神崇拜，对赏罚的侧重差异和信众不同的自我认同。

第五章关注信仰的承续和传播。无论新教还是天主教都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并仍然在不断的与中国文化产生互动。天主教的本土化是传入之后不

断适应中国社会的结果。但是天主教本土化的过程却是曲折的，当下天主教呈现出来的许多特点也受到历史过程中“礼仪之争”而导致的禁教的影响。现在天主教的传播也表现出多种灵活性和地方性特征，除了运用家族传教之外，还采用音乐、大学生联谊会等多种方式来传播和加深年青一代人的信仰。而新一代的青年天主教徒很多时候是在经历了迷惑和反思之后才跨入了自我认同的新层次，由一种被动接受的习惯转变为主动的认同感。

第六章尝试分析天主教传入中国后具有民间化倾向的表现和原因。笔者分析了内在和外在因素，包括从教会传教角度上对社会政治历史等背景的考察，从信众角度上分析经济与文化背景对个体的影响以及人的能动性，还从主位和客位的双面角度对结论进行具体阐释。可以说，外部的社会文化结构力量以及内部的意义追寻的交互作用形成如今具有中国地方文化特色的乡村天主教。

最后一章中，笔者总结当代乡村天主教的发展特点，并尝试为中国乡村天主教和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做出一种预估，认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两者不会出现谁最终胜利的情况，而只是会在阐释层面上压制对方。两者之间的文化碰撞也会继续进行。虽然中国乡村天主教与民间信仰之间仍存在许多观念和仪式上的差异，前者早已不同于国外那种经院化的天主教，而具备了一些中国乡土信仰的类似特征。

三、研究方法

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定量研究擅长通过数字和统计分析来了解社会现象的目标，定性研究则倾向于通过参与观察、深入访谈来实现对人们行为、心理和情感互动的理解。因此，一般认为定量研究更适合于大规模的调查，而定性研究更适于对个案的深入挖掘和剖析。当然，现在的社会科学调查研究通常会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二者得以相辅相成，取长补短。

宗教作为一种包含外在仪式和内在信仰，融合情感的一种现象，宗教社会学和宗教经济学也不乏采用问卷调查和统计资料进行分析的，也的确在一些方面能够有助于了解宗教现状及全貌，然而人类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情感和思想的群体，采用超脱出主观情感的“客观”方式总会给人隔靴搔痒之感，让人难以实现深入的理解，人们发现“任何方法和认识都不能逃脱每个研究

者个体和研究对象及其相互之间的主观因素和影响”（Flick, U, 1998）。

本研究在资料收集上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的方法。

一、通过查阅地方志、相关新闻报道、宗教内部资料以及学术论著等，从多种途径了解调查地区的宗教历史和现状，如宗教活动场所的数量、神职人员与教徒数目、管理方式，民间信仰有关历史等。二、参与观察是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展开实地研究时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是定性研究采用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资料来源的重点，其特殊性在于以研究者作为调查工具，凭借研究者的主观认知以及在“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的不断转换，实现投入理解和客位解释相结合的目标。三、深入访谈通常采用无结构式访谈，调查者通常只是有着大致主题，依赖调查者和被调查者互动双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常常能够获取比访谈者直接提问更为真实而丰富的资料，更可能对文化现象的分析和处理达至格尔茨“深描”的境界。然而深入访谈在分析上存在困难，而且费时较长。针对这两个难点，本研究一方面采用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等方法分析资料，另一方面长期多次地进入田野能够保障调查时间的充沛，且由此与报道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事半功倍。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更倾向于自下而上的进入田野的方式，不主张大张旗鼓或者打着某某机构或大学的名号自上而下开展调查，原因在于后者容易导致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形成一种隔膜，难以获得真实资料。虽然现在的田野调查通常由于各种繁杂的事务已经很难实现长期不间断地与被调查者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然而好在有了交通的便利，我们可以通过较长时间、多次的田野调查和回访⁴来实现同等甚至更好的调查效果。

4 这种回访研究在人类学调查研究中有很多著名的例子，既有如费孝通先生自己跨越不同时间段的多次回访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给这个村子起学名为：“江村”），也有先行者和接替者在不同时代先后踏足大陆多个著名田野点，如庄孔韶重访林耀华先生闽东的家乡，做了新的承继性研究。可以参考庄孔韶，回访的非人类学视角和人类学传统——回访和人类学再研究的意义之一，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1）；庄孔韶，回访和人类学再研究的专题述评——回访和人类学再研究的意义之二，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2）。而且这种回访也不仅仅是局限在国内人类学研究，从林德回访中镇、弗思回访提科皮亚、哈钦森再研究努尔人到弗里曼重访萨摩亚、韦纳重访特里布罗恩德岛以及刘易斯重访特波茨兰村，参见黄娟，反思回访与再研究：历史、场景与理论，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